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6月16日

◆理论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特点

□边立新

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伟大变革，因而充满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准确把握改革的历史特点，对于夺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性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特点。现代化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和展开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培育和塑造充满时代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现代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我国的改革正在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改革是从政策调整开始的。由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我国社会面貌才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为改革的制度转向奠定了基础。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单纯的政策调整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新要求，必须从政策调整转变为制度创新。政策背后是制度，新的政策一旦受到旧制度束缚，制度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事实上，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说到底需要制度支持。和政策相比，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制度。邓小平早在1992年就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实现邓小平当年的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尊重客观规律，把被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制度化。要敢于割除旧体制的弊端，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形成富有现代性内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依靠现代化的人来建设，依靠现代化的人来实施。因此，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制度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现代化。

整体性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人类社会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离开其他要素而孤立存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表明，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之间相互牵连、相互掣肘。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决定了改革的整体性。

我国的改革正在从单向突破转向整体推进。在改革的初始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采取循序渐进、实验先行、不断探索、逐步推广的方法。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渐扩展到城市；从沿海开始，逐渐扩展到内地；从局部开始，逐渐扩展到全国；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法，不仅使我们很快启动了改革，而且避免了激进式改革所带来的震动，实现了社会的平稳发展，为整体性改革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单项突破的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改革说到底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对象的不同领域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每一个领域的改革必然要牵涉到其他领域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发展，单项突破式的改革效益在递减，局部领域的改革因其他领域的制约不可能得到深化。这就是我国的改革所面临的新的历史特点。“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着眼于改革的整体性，积极主动，顺势而为，不失时机地把改革从单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如果错失良机，不但影响改革的推进，甚至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也会因此得而复失。当然，我们强调改革的整体性，不是否认改革的重点。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有重点和难点问题。只有在各个领域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才能实现改革的整体推进。

深刻性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的深刻性就在于，这是一次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本质则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必须透过思想关系，深入研究利益关系。

我国的改革正在从观念变革转向利益关系的调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否认，改革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利益关系调整的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摆脱贫困是人们的普遍利益诉求，我们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诉求中启动的。改革几乎能为所有的人带来利益，这是一种普惠性的改革。改革的阻力不在利益关系方面，而在思想观念方面。一些人不愿改革，主要是担心改革会“葬送社会主义”，害怕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面对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我们不搞争论，大胆探索，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在行动中统一思想，最终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开辟了一条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现在的改革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由于我国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总体上说是历史的进步，但其中也蕴藏着需要反思的新问题。由于改革的不到位，我们的体制还不健全，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公平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两种因素并存。进而在利益群体分化中，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并存，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并存，利益关系复杂化和利益矛盾尖锐化并存。因此，利益关系的调整就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是孪生兄弟。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超越狭隘利益的局限性。面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我们必须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只要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就要坚定不移地改。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公正性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程。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只能是在部分先富的基础上，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我国的改革正在从部分先富转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穷。为了摆脱贫困，消灭贫穷，我们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关注改革的公正性，并不是质疑部分先富政策的正确，而是要对部分先富的现象给予公平追问，进而走向共同富裕。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既不能走普遍贫穷的老路，也不能走两极分化的邪路，而是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公平竞争，也有不公平竞争；既有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有非市场经济的因素。尽管我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不成熟，体制和制度上的弊端还存在。这些弊端为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温床。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要靠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靠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靠体制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这一切都依赖于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秉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公正性原则，用公平正义这个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本文系中央党校2014年度校级科研重点项目“唯物史观与全面深化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DXZD201401）

◆理论动态

不应忽视的文献及其思想

□聂锦芳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建构是通过两种合力来完成的：一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批判，二是他们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辨析和论争。就后一方面说，我们可以在其著述中至少找到如下几种社会主义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深入研究和评论。

乌托邦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在《德国农民战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述中，找到对以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和维拉斯等为代表的“在16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的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梳理和评论。

平均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经说过“在18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这指的就是这一派别。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等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到其主要代表人物诸如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利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人性论，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的探讨和对社会主义合理性的论证。

空想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派别，是此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近代全盛时期的最高成就。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共产党宣言》《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尤其集中和深刻。

空想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马克思1861年11月10日致路易·瓦托的信》等对此论述甚详，对其主要代表人物诸如卡贝、布朗基、德萨米、魏特林等都有十分深刻的评论。

封建社会主义。这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的社会主义，“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唱着“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调子，代表人物有迪斯累里、卡莱尔、曼纳斯等，在《共产党宣言》《六月革命》《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评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其进行了分析。

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拉梅耐、毕舍等为代表的这一派别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最喜欢的一个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Le Christianismec'est Le Communisme）。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话来证明这个公式”。他们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对其进行过论述。

工场社会主义。其首倡者是勃朗，提出一种试图通过建立“社会工场”来消灭现代竞争的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国的改革运动》《恩格斯1847年10月25—26日致马克思的信》《恩格斯1847年11月14—15日致马克思的信》和《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其有评论。

无政府社会主义。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其代表人物是施蒂纳、蒲鲁东和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在下列著述中涉及这一派别：《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1846年9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哲学的贫困》《论住宅问题》《机密通知》《论权威》《恩格斯1872年1月24日致泰·库诺的信》《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

“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德国知识分子中的部分小资产阶级在德国封建主义尚未铲除的情况下，反对德国发展资本主义，美化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维护德国封建统治制度，是诉诸“哲学思维”和“美文学情感”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祖国产生的这一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尤其系统和详尽，对其代表人物赫斯、格律恩、吕宁、克利盖、皮特曼和泽米希等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可参看《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公告》《恩格斯1846年10月23日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驳卡尔·格律恩》《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等著述。

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承认国家干涉经济事务的合法性、从而主张强化政府职能和对旧的国家学说提出重要修改的学说，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序言》《恩格斯1881年3月12日致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信》《马克思1865年2月23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有过分析和评论，涉及的代表人物包括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等。

议会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忧虑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景从而在晚年极为关注的派别，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恩格斯1883年5月22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致奥·倍倍尔（1885年6月22—24日）》中对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提出过分析、批判和忠告。

费边社会主义。对以古罗马拖延战术家“费边”命名的这种团体和主张社会改革必须以“迟缓”和“渐进”的步骤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的相应的思潮，对其主要代表人物萧伯纳、韦伯、华莱士和奥利维尔等，恩格斯在晚年很多书信中做过评论，特别像《恩格斯1890年2月8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等。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只是根据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阅读而勾画的一个研究“路线图”，很可能还有遗漏之处，尚需补充和完善；而且，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各个派别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肯定有重点非重点之差别，因此，目前的排列还不够逻辑和科学；随着以后研究的深入，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辨，可以甄别和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正面见解和思想体系。

◆新时期论坛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宽度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命题本身的基础性研究，理论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等关系的互动研究三个方面不断推进，取得很大成绩。但必须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仍存在学理研究不够、“问题意识”缺乏和国际视野欠缺等局限。今天，我国初步进入邓小平所说的“发展起来以后”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应从三个新的维度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加强学理研究拓展研究深度

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无法回避的因素。上一世纪伊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它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密切耦合，是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意蕴并得到广泛政治关注的概念。但过分强调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其学理研究，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陷入过于狭窄、难以深入的境地。这也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什么简单重复且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初步“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继续注重从政治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学理研究。这不仅是要为其政治研究提供学理支持，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迫切需要。起初，我们较为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论断与历史条件、发展进程，后来进一步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今天，我们还要进一步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发展路径与疑难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学理分析入手，强调其研究的学术含量和学术旨趣，从而提升其研究水平，拓展其研究深度。当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研究，决不是否定其政治意蕴。相反，“学理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政治研究的基础。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研究，就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理清其基本要素，阐述其基本理论，揭示其内在逻辑，梳理其历史进程，发现其基本规律，把握其基本走向，评价其基本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强化问题意识拓展研究广度

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内含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源于它面向并破解“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践中展现其魅力，在解决问题中丰富其理论内蕴。从问题意识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会使我们的研究面向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并拓宽其研究广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回答或破解“中国问题”的进程。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科学发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今天，我国处在初步“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甚至比不发展的问题更多、更难、更令人苦恼；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许多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命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首先必须直面并破解诸多“命运性问题”。当下，我们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势，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这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机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当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研究方面要直面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命运性问题”。而真正的“命运性问题”需要具备“从实践发展中来”“与中国发展命运密切相连”“与人民息息相关”三个因素，且与改革发展稳定这一总问题有关。“命运性问题”必须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从实践发展中来，并反映时代发展脉搏，决定着中国发展命运，否则就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我党在历史上曾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恰恰说明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且脱离实践的危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命运性问题”，还必须切合中国发展命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特征。同时，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只有这样，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成为被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有用的理论武器。“命运性问题”还必须与人民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具体来说，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它所面对的“命运性问题”主要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公平分配利益、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结构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把握力量转移趋势和促进公平正义等。如果这些“命运性问题”处理不好，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的形象就会受损，为此，必须高度关注这些“命运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展现出来的一种理论自觉和理论责任感，只有增强这种理论自觉和理论责任感，才能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广度。

注重国际视野拓展研究宽度

不可否认，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长期存在着自我封闭、自说自话、自言自语的问题。当然，在发展初期，多注重国内视野，研究中国问题，这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等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其世界意义和一般意义，由此也引起世界关注。在这一世界历史背景下，如何发掘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世界意义，在关注自身问题的同时具有国际视野，就变得尤为紧迫。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国际视野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把中国成功经验与中国道路传播到国外；二是积极吸收国外丰富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与基本经验。这二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相辅相成，不可缺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也开始在国际社会舞台上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为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国际社会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此外，在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也增强了中国在世界对话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因此，今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多着力从国际视野出发，在凸显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的同时，也要思考关于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而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另外，要合理吸收和借鉴国外丰富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尤其要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合理的思想资源。因为我国初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西方文化传统为背景，反思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一定意义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这也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妙药良方，也存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误读。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的理论，更不能妄想西方学者能为我们出谋划策、提供现成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者”的角度更加清晰地理解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应通过比较研究，从中得到必要的警示，同时也可以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相对优势，更好地讲“中国的故事”。

无论是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世界，还是吸收和借鉴国外一些理论的合理因素，都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既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丰富发展的必要性，又要展示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的一种理论自觉。我们应从国际视野出发，在介绍、比较、借鉴中，从不同层面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执笔人：崔丽华）